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文化视野

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核心力量

□ 吴　鑫

1931—1945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四大国”之一和“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毅然承担起扶助亚洲弱小国家的道义责任，成为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坚强核心。

号召东方各民族团结抗战

早在1939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作为亚洲反法西斯主要力量，处于抗战一线的中国特别强调东方各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在延安的东方民族友人座谈会，为加强对东方各民族斗争的指导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决定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台湾等地的130余名代表参会。大会听取了朱德的总报告和各国各民族代表的情况汇报，深入总结了其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大会成立了“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确立了“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的宗旨，选举了最高权力机关、主席和执行委员；通过了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成立东方民族学院和培养民族干部的提案；并向中国、日本、苏联、美国和英国发布了告人民书。这一举动，奠定了东方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政治和组织基础，将东方各民族的反侵略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增强了中国在东方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影响和号召力。

入缅支援盟军作战并入越受降

1942年1月，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成立，改变了中国孤军抗战的局面。盟国组建了包括中国、越南和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由中国领导人担任最高统帅。此后，中国军队除在国内抗日外，还数次出国履行战区职责，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担当和牺牲精神。

中国两次入缅支援盟军作战。1942年2月，应英军紧急请求，中国派出第5、第6和第66军共10万人的精锐部队，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到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转战1500多公里，取得了同古保卫战、仁安羌解围战的胜利，掩护英军安全撤退到印度。特别是1942年4月仁安羌一役，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与日军激战2日，救出被围困的英军7000余人和被俘的英军官兵、美国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被解救人员“个个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甲午战争之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出兵援助邻邦抗击侵略，付出了6万人的重大牺牲，打出了国威军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广泛赞誉。英国《泰晤士报》赞扬中国军队“以少敌众，英勇果敢，将使盟军之战绩，益增光辉”。1943年10月—1945年3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再次出国作战，与美军一道实施了缅北和滇西反攻，歼灭日军4.9万余人，收复失地8.3万平方公里，成功打通中印公路，有力配合了印缅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反攻。

1945年8月，根据盟军最高统帅第1号命令，中国主持“中国境内（东北地区除外）、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受降。1945年9月—1946年3月，中国派遣陆军第1方面军进入越南，在河内设立占领军司令部，接受北纬16度以北的日军投降，对稳定战后越南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援助弱小国家抗日

中国一直以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斗争为己任。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开始大力扶助朝鲜抗日力量。1942年12月，国民政府通过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不但给予经济支持和政治声援，帮助整合各派抗战力量，还将其武装——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编入中国军队序列作战。中国共产党也支持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创建了祖国光复会和朝鲜人民革命军。

越南的抗日力量也是以中国为基地发展壮大的。1942年3月，中国拟定了《对越策动计划大纲》，指导越南各派民族力量成立了越南革命同盟会。越南革命家黄文欢回忆，我们的同志“一面参加中国老百姓的抗日活动，一面在（越）高平省边区附近发展革命力量”。1944年8月，“越盟”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的支持下回到越南，开创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42年4月，中国提出“还要担负起保卫缅甸的任务”。为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中国选派专人赴缅，建立敌后组织机构和工作据点。1943年，缅甸“我缅人协会”领导人德钦登佩访华后，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带回国，该书后来在缅甸共产党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干部中广泛流传，促进了缅甸人民的抗日斗争。

更为难得的是，中国还引导海外侨胞参加所在国的抗日斗争。1942年在中英两方共同指导下，在印度组建了华侨抗日武装“136部队”。从1943年5月到1945年9月，“136部队”先后20次派员潜入马来亚敌占区搜集情报，为盟军制订对日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1942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成立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以新四军和八路军为榜样，也称“第48支队”，在3年多的战争中，作战260余次，歼敌202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940余支，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支持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殖民主义侵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认为，如果“单独顾到本身的自由平等……不管旁的弱小民族……那就完全违反我们的民族主义”。1943年9月，中国将外交政策目标确定为对内恢复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对外辅助亚洲各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更加积极地为东方被压迫民族代言。

早在1941年8月，美国和英国发布的《大西洋宪章》首次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中国表示积极拥护，但同时指出，宪章只提到了摧毁纳粹暴政，却“未提日本之名”。中国强调：大西洋宪章，特别是解除各侵略国武装和民族自决等原则，应适用于全世界；日本领土以1894年之前的范围为准；各民族各种族平等。1942年3月，中国呼吁盟国承认印度、越南、韩国及菲律宾的独立。这些举动，反映了中国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解放的坚定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各国的独立运动。

中国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坚持亚洲的独立解放。中国坚持将“使朝鲜自由独立”写进《开罗宣言》，为其获取了正式的国际法保证。在中国的努力下，中美达成了战后共同协助越南和泰国独立的共识，罗斯福还提出，英国在印度应该满足于它的特惠经济地位，必须给印度人民以政治独立。这极大地促进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

中国还力促将民族自决原则列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在1945年4—6月的旧金山制宪会议上，美、英提出托管的目的为“自治”，法国提案则根本未涉及殖民地独立问题。中国提出，“代管领土之目的在于改善被代管领土之人民经济教育状况，促进其社会福利，并扶助其完成自治或独立”，从而废除殖民制度。中国提案遭到了美、英、法、澳、南非等国的强烈反对，但中国“态度异常坚决”，形成“与英美尖锐之对立”。会后协商中，美国代表提出，如果中国同意美英等国的意见，可以在托管理事会给中国一个永久性席位。但中国表示并不想在这一问题上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殊好处，而是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中。在中国的坚持以及苏联和广大中小国家的支持下，民族自决被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中国成为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前途的象征和希望的源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坚定抗日、扶助弱小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反法西斯盟国的承认和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尊重与拥戴。正如1939年缅甸访华团团长吴巴伦指出的，中国的抗战“为东方和平独立神圣伟大之工作”，中国“所负使命，有如合众国之在美，苏联之在欧”。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亚洲抗日斗争的中心和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坚强核心。

随想录

以礼育君子

□ 力　行

儒家的礼，既是伦理原则，又是道德规范。从个人修养出发，由“修身”到“齐家”，进而“治国”到“平天下”，是儒家为政的传统思想方式，也是儒家知识分子塑造理想人格实现仕途理想的传统方式。其中，“修身”是根本。而“修身”得依靠“礼”。修以礼，礼是修身的基本方式。孔子便极重视礼在教育中的作用，《论语》中有多处关于孔子以礼教育弟子的事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可见，孔子认为礼教是成人的标志，是立足社会之前的必修课，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故而“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者不可不学也……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摄”，“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孔子之后的儒家也把“礼”当作教育的一项内容。《汉书·艺文志》将《礼》经列于“六艺”之内：“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继事，信之符也。”成书稍后的《礼记·经解》也假孔子之口说道：“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敬庄重，《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儒家重视礼的教育作用的一个前提是人具有可塑性。人经过教育，是可以由恶至善的。还因为礼注重的就是对人内心的作用、人的内心修养，把行为的规范变成人内心的自觉信念，这正是教育之“本”。这种思想也正与儒家所提倡的“人道”思想相一致。

儒家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将人培养成“君子”。“君子”是人格圆满表现的理想人物，其中以德行为重。而“礼”是诸种德行中很重要的一种。《论语·卫灵公》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礼记·礼器》中也说：“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又《左传·昭公七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君子既以德行为重，必重“行”甚于“言”，这也正符合了“礼”的精神。“礼者，履也”，其所重正在于“行”，就是切切实实地具体去做，“言而履之”，“践而行之”。

《仪礼》所载的种种礼仪，在其内容上包括了儒家君子必须具备的“仁”“义”“忠”“信”等诸种品质。也即是颜渊所说的“约我以礼”的“礼”所包含的内容。

正因为礼于教育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古代社会的官学中“礼”是一门重要的学科。早在商代学校的教学中就已有了礼乐的内容了。在西周时期，文化高度发达，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类，国学是中央官学，乡学是地方官学。国学又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级。根据历年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记载，当时的“射卢”，即后世的“射宫”，是学习射箭和行大射礼的地方。习射和作乐舞都属大学的内容。乡学有“庠”“序”“校”等形式，其中“庠”“序”是举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地方，当然也是学礼的地方。乡学中为学生演习乡射礼和乡饮酒礼的是本乡中德高望重的老人。目的是想让学生通过观礼而能守礼制，安名分，听教导，树立建功立业的思想，培养尊敬师长的品德。

当时教学最基本的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在六艺中的地位最高，因而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又因为礼在许多场合如祭祀、朝会、征战、宴飨、婚丧等活动中，有着仪式的进退揖让，又必须配之以乐。礼乐相须为用，成为教育的核心。

到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的著名的“孔门四科”，其所习之“礼”是指当时实行的各种礼典的具体仪式。其中音乐演奏以“诗”为乐章，诗、乐结合便成为各种礼典的组成部分。因此“从礼、诗、乐三者之相互关系上看，举行礼典需要诗、乐组成的音乐配合，那么在教学上也应以礼典演习为主体，三个科目中学诗、学乐是从属于学礼的”（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礼记·王制》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可见“礼”一直是儒家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西周到孔子，不论官学、私学在学校的设置、管理方面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特别是以“六艺”为中心的教育内容，奠定了中国二千年封建正统教育的基础，其影响极为深远，其中“礼”的教育更是儒家理想教育的必修课。

陪审团制度的灵魂是爱和良心

□ 王　宇

电影《十二怒汉》，是俄罗斯电影的经典之作。故事从一名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北高加索车臣少年涉嫌杀害自己的俄罗斯养父而被提起公诉开头，之后整部电影围绕着对这起杀人案件的陪审团审议展开。三天的法庭公诉结束，12名不同身份和背景的陪审员最终成为了决定被告命运的审判官。

由于法院装修，陪审团的商议地点改在了法院旁边的学校体育馆。在俄罗斯的学校里，本该纯粹的地方，艺术却被封锁，毒品和性肆无忌惮地充斥其中。导演在电影开头就讽刺了俄罗斯社会的乱象，正如一位陪审团成员所说：俄罗斯早就已经没有了灵魂。

无论俄罗斯还有没有灵魂，这案子都要讨论出结果。但12位陪审员们看上去却各怀心事，大家只想着尽快表决之后各回各家。导演透过陪审员们玩世不恭的态度向观众们抛出了关于陪审团制度的第一个问题：在陪审团制度中，如何能保证陪审员们愿意尊重他人生命，探究事实真相，而不是走个过场，敷衍了事呢？聪明的导演用剧情的转折给出了答案。

正当大家决定投票，尽早散伙的时候，有人倒戈了。11票有罪，1票无罪，陪审团中的一位科学家投了反对票。科学家反对的理由是在他自己命运绝迹时，一位陌生人的尊重和关心让他重获新生。因此，科学家认为每位陪审员都应该尊重自己手中的审判权，严肃地对待一个孩子的后半生。想想我们买西瓜都不会胡乱猜哪个熟了，哪个没熟，轮到判定一个孩子是该活还是该死时怎么敢随随便便呢。西瓜买错了还能重新买，但对于车臣少年来说，一旦被判决有罪就意味着将永远失去生命。科学家的话引发了其他陪审员的思考，大家开始认真对待案情，陆续有人结合自己的经历，发表观点。

陪审团制度，显然是导演想透过这部电影探讨的核心问题。在陪审团制度的体系中，律师和法官扮演的更多是助理、主持人和专业咨询师的角色。律师负责搜集证据，还原真相；法官负责维持庭审秩序，保证庭审按照正确的司法程序顺利进行。12位陪审员才是最终的裁判者，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身份，却要在一起商量、探讨、博弈，最终共同决定一个陌生人是否有罪。

要理解这个制度，还得上溯到古希腊的500人议会制度。在古希腊，500人议会是各个城邦的最高审判机关。500个人凑在一起决定城邦规则，判定罪犯生死。500人议会制度中的议员们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他们在判决被告生死时的职责不是还原真相，而是按照自己对案情的认知给出判定。一个人的判定并不能代表城邦的正义，它只代表这个人所处社会阶层对案情的普遍认知，500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按照规定程序给出的符合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共同判决才最终代表了城邦的正义，也是这个城邦给予被告的最后审判。从500人议会，到陪审团制度，西方社会的特色民主在审判制度中贯穿始终。

在电影中，科学家、出租车司机、守墓人、钢琴家、传媒大亨等不同背景的陪审员按照司法程序也分别讲述了自己对于案情的理解。

犹太人讲述了自己父亲背叛母亲与一位有夫之妇私奔的往事，但他却不怨恨父亲，他用亲身经历证明：凡事皆有可能。工人大伯则认为即便车臣孩子有罪，大家也应该法外开恩，再给懵懂少年一次机会。随着探讨的深入，陪审员们开始理性推理案情的细节，大家详细分析了作案工具，辨别证人证词，模拟犯罪现场，越来越多的陪审员改变了最初的判定，他们认为车臣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从证据中推出，孩子的养父是其生前的仇人所杀，他们杀害他会得到巨大经济利益。至此，陪审团12人，尽职尽责，推理出了真相，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又有人中途倒戈了。

一直保持沉默的艺术家在明知道车臣少年无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孩子有罪。他的理由是，那孩子待在监狱里比待在外面更安全。孩子若被判无罪，那杀死他养父的人，也因为特定的原因必然不会放过这孩子。故事到此，导演抛出了对于陪审团制度的第二个思考：陪审员们施行审判的最高标准该是什么呢？

导演是在问：在法律之外，陪审员对被告还有义务吗？正如在影片中陪审员们所面临的选择一样，孩子的命运被彻底交在了陪审员的手中，这交付超出了法律的范畴。如果判定孩子谋杀罪名成立，那不仅违背了事实真相，孩子也会必死无疑。可一旦公布真相，宣判孩子无罪，陪审员们看似履行了职责，实际上却是将孩子送给了杀父仇人。大家有些不知所措，因为角色变换，爱与良心成为了陪审员，12位陪审员则成为了被告。他们该如何向自己的良心陈明无辜呢？正如在影片最后，导演打出了一条字幕，上面写着：法律很崇高，但那仅仅是开始，当那更高的、仁慈的法律被抛弃后，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十二怒汉》这部将近三个小时时长的电影没有一个特效镜头，就连场景都简单到只有一个。12位陪审员，12段故事，围着一张桌子，纯粹的语言激战，揭开了一桩命案的真相。导演借着对陪审制度的探讨，试着在向观众们表达一种以爱和良心为最高准则的审判标准。那意思是说任何审判制度，都是以爱和良心为标尺的。无论审判者是少数精英还是大多数的民众，无论参考的法律是由哪个机构通过的，如果审判者自己缺乏爱和良心，这是否也算一种犯罪呢。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在某一个案例中时，都有辱某种审判制度设置的初衷，最终结果都可能是该地区民众愚昧指数的广告牌。

有所思



在玩耍中产生创意

□ 金　磊

唐山地震纪念碑设计者李拱辰在忆及儿时建筑启蒙时说：“小时候曾有几个年头，坚持从东城到西城的徒步之旅……现在想来路上风光倒也惬意，有红墙、黄瓦、碧树、蓝天，有街市、庙会、山水、公园……投身建筑之门才回味到，这原是一条集中了中国古建筑精华的展示长廊，难怪她有如此的魅力，至今享之不尽、用之不尽。”

有哲人说，走远了，别忘记初心。笔者很同意其意，希望更多成功的建筑师在感怀往事时，发现曾有过的未被世俗化的初心。

童年乃人生的一缕曙光，无论一个人成人后怎样，他或多或少都保留一些孩提时的好奇与天真。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说：“小的时候虽然不懂建筑，但对济南一些有特点的建筑物还是有印象的，如山东博物馆和老齐鲁大学的中式建筑，济南老胶济铁路火车站的德国塔楼与站房。”宝贵的童年时光给了人们开启建筑之门的钥匙，许多建筑师后天的品质来自童年的感受与环境，在当下倡言恪守童心，是为了城市与乡村建筑设计的真善美，是为了从纯真中找到慎思与笃行的理性设计灵光。朝花夕拾，最忆是童年，童年的永恒贵在于“真”。

儿童们在一起玩耍的意义不仅仅是游戏，更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学会做决定，学会如何控制情绪，如何结交朋友。俗话说，有童心的生命没有老朽，有诗意的人生没有冬天。童年会培育出创意设计的萌芽，玩耍本身获取知识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可以从中获得主动学习的能力。这一点恰如国外较为成熟的“儿童博物馆”教育一样，去博物馆让孩子们体验“玩耍”，让孩子学会到社会去学习，学会到博物馆找资源，让孩子潜移默化地成为“终身学习者”。可以设想，一个有主动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的儿童，他不太可能循规蹈矩，很可能具有创造力。

建筑是科学之美与艺术之美的载体，从营造氛围入手，童年阶段初知建筑文化至关重要。一般来讲，用建筑来传播美好对成年人来说比较容易，但对孩子来说，真正能打动他们的是兴趣，是有潜在智慧及审美情趣的内容。现阶段，国内尚无十分契合中小学生的建筑文化专门读物，从建筑文化审美的养成教育讲，十分需要建筑文化普及工作。中国尽管已是世界建造房屋数量的大国，但我们的全民建筑文化意识是很一般的，对建筑的审美观教育也是缺失的，公众文化教育的课程中，更少见建筑文化内容。因此，建筑是什么？建筑师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再认知的过程。前不久，有一颗星以建筑大师梁思成的女弟子张锦秋院士的名字来命名，这颗天穹上的明星，照亮的不仅仅是当代中外建筑界，同时照亮的是一直瞩目她的“三秦”父老乡亲，希望张锦秋的建筑精神在孩子们中间普及并传承。

教育问题谈